

中国 华侨历史学会 成立十周年 纪念论文集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编辑部编

東方出版社

D 13.43
16

0151 186877
03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 成立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编辑部编

東方出版社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成立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ZHONGGUO HUAQIAO LISHI XUEHUI

CHENGLI SHIZHOUNIAN JINIAN LUNWENJI

编者/《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徐砚华 吕异芳

版式设计/程凤琴

责任校对/李兰亭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社

社址/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5.25 字数/391000

版次/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 200

ISBN 7-5060-0446-1/G·68

定价 20.00元

目 录

继往开来，开创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的新局面

(代序言) 萧 岗 (1)

论文化认同与华人社会 林其铤 (14)

战后东南亚排华运动探索 周南京 (29)

马来西亚种族政治下的华人与印度人社会 梁英明 (47)

战后澳洲华人社会的变化及发展趋势 黄昆章 (60)

战后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变化和华人社会的
发展 张向华 (72)

论战后新加坡华人生存发展之路 黄松赞 (86)

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认同”的转向 蔡仁龙 (108)

从华人的宗教信仰探讨印度尼西亚的同化
政策 许国栋 (127)

战后东南亚华人文化的保持与族群关系
的演进 谭天星 (140)

海外华人经济与传统社会组织 陈庆德 (159)

初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加坡华人资本 黄露夏 (176)

90年代的马来西亚华人资本 廖小健 (187)

印度尼西亚新政治秩序下经济的振兴与华
人资本的作用 董孟雄 秦茂松 (199)

从财团问题的讨论到原住民与非原住民间
题的争论 郑仁良 (218)

试论林氏（绍良）企业集团的发展道路·····	温广益	(231)
李光前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及其成功背景 ·····	李天锡 李仁生	(253)
从海外华侨华人创办高等学校的历史看 华文教育的发展趋势·····	林蒲田	(268)
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的演变与现状·····	张秀明	(283)
论泰国华文教育的复苏·····	黄绮文	(298)
新中国政府对海外华侨政策的变化 (1949—1965年)·····	庄国土	(308)
试析清代前期华侨政策及海外移民·····	许肇琳	(324)
试析广西迁徙越南的少数民族华人·····	向大有	(340)
战后华人新移民问题初探·····	黄英湖	(356)
略论涌往加拿大的香港移民潮·····	巫秋玉	(371)
2010年北美将成为海外华人第二中心·····	张 俞	(385)
海外华侨华人在中国大陆投资历史的回顾 与发展趋势·····	林金枝	(399)
论张弼士在晚清发展民用工业中的历史作用·····	陈 民	(416)
1912—1916年海外华侨讨袁活动述评·····	任贵祥	(428)
战后泰国华侨救济祖国粮荒运动之研究·····	张映秋	(447)
日本的华侨华人研究述评（1980—1990）·····	郭 梁	(463)
编后·····		(482)

继往开来，开创华侨华人 历史研究的新局面*

(代 序 言)

萧 岗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已经成立10周年了，这是不平凡的10年。10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侨史研究展现出令人欣喜的局面。现在，请允许我代表理事会汇报学会过去的工作，并就今后的工作提出一些设想。

一、10年来的主要工作

1981年12月，来自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83个单位的120余位学者、专家和侨务工作者聚会北京，宣布成立中国华侨历史学会。这是我国侨史学界值得纪念的一次盛会。10年来，在各方面的支持和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学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目前，全国已有28个地方侨史学会，其中省、市、自治区级的10个，市、地、县级的18个，此外还有4个省、市侨联成立了华侨历史研究小组。这些团体在团结侨史工作者、推动侨史研究、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0年来，我们先后在北京召开过3次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

* 这是萧岗同志1991年12月在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纪念学会成立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

参加会议的有近百个单位的代表，收到的论文和资料达200余篇。为了交流经验，我们在江门召开了全国侨史工作座谈会。在对外学术交流方面，我们参与了1985年在广州中山大学召开的“华侨华人历史研讨会”和1989年在厦门召开的“战后海外华人变化国际学术讨论会”。1984年，应海外有关学术团体邀请，洪丝丝会长率团访问了西班牙、意大利。1990年和1991年，派人参加了在新加坡、菲律宾召开的学术讨论会。此外，我们还接待了来自美国、法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访问学者数十人，并与他们建立了联系。

在此期间，学会编辑出版了《华侨华人书刊目录》和《华侨华人史研究集》，还协助出版《美洲华侨华人史》、《世界华侨华人词典》、《南侨机工回国抗日史》、《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战后海外华人变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等10余本书。此外，还编辑出版24期会刊、9期《侨史资料》和28期《华侨华人资料报刊剪辑》。

10年来，我们虽然做了上述一些工作，办了几件实事，但由于主观努力不够和受客观条件限制，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的工作与大家的要求仍有较大的差距，学术交流活动缺乏经常性，对地方学会的工作了解、帮助、推动不够，学会的组织、协调机能还未充分发挥。这些有待于今后努力改进。

二、国内侨史研究的新面貌

我国的侨史研究起步较晚。如果我们以1905年梁启超在《新民丛刊》上发表的《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作为我国侨史研究的开端，迄今只有80多年。80多年来，我国的侨史研究走过了一条十分艰难曲折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主客观原因，侨史

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寥寥无几的研究机构更遭厄运，研究人员四散，多年积累的一些资料被弃置、毁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侨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0年，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但对我们来说，却是非常关键的10年。放眼全国，大家都会感到，经过侨史学界的共同努力，中国的侨史研究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一）一支专业与业余相结合的侨史研究队伍已经初步形成。

中国早期从事侨史研究的只有少数几位历史学家和社会学者。“文化大革命”前，虽然设立了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等机构，但仍处于孤军奋战的阶段。那时候全国专职和兼职从事侨史研究的，估计不会超过100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暨南大学、华侨大学、全国侨联和福建省社科院相继成立了四所规模不等的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以及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云南、广西社科院的东南亚研究所等单位，也有不少科研人员从事华侨华人史的研究。值得指出的是，建立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文革”前建馆的厦门华侨历史博物院，恢复后经过调整，内容更加充实。1984年建成的广东开平县华侨博物馆，是国内第一所县级华侨博物馆。浙江省青田县华侨历史陈列馆已经破土动工。目前，北京、泉州、梅州等地都有筹建华侨华人资料中心或华侨历史博物馆的计划。在上述的科研机构和文物单位中，聚集了一批研究骨干。

华侨历史学会作为一个群众性的学术团体，起到了联络侨史学界的纽带作用。目前，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会员有238人。28个地方学会的会员大约有1500余人。当然，并不是每一位会员都直接从事研究工作，但现在全国专业与业余相结合的侨史研究队伍

估计已有600余人。

（二）侨史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从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中，国内出版有关华侨问题的书籍仅有40余部。其中只有《华侨人口参考资料》、《美国迫害华工史料》等三、五部侨史资料性的著述，其余多为时事政策读物。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竟没有写出一部华侨史专著和一部完整的华侨人物传记。由此可见，侨史研究基本上是一块等待开垦的处女地。

据不完全统计，从1981年至1991年的10年内，国内已出版的有关华侨历史和现状的著述、资料共计153部，约3600余万字。其中学术著作29部，810余万字；论文集19部，近400万字；译著16部，325万字；普及读物12部，255万字；资料27部，近900万字；内部出版的集子和资料汇编50部，1,000万字。

这些成果是令人鼓舞的。首先，很多侨史资料得到挖掘整理。陈翰笙主编的10辑350万字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为研究华工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在国内外引起了较大反响。此外，《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陈嘉庚年谱》、《晚清海外笔记选》、《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华侨与辛亥革命》、《东南亚华人经济》、《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广西籍华侨华人资料选编》、《泰国归侨英魂录》等，都是较好的专题文集或资料。

其次，一些侨史专著相继问世。1985年，温广益、蔡仁龙等4人编写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史》出版，这是建国后我们自己编写的第一部华侨史。随后，其它一些著述陆续出版，并且得到各种不同的奖励。1990年，李春辉、杨生茂主编的《美洲华侨华人史》、朱杰勤主编的《东南亚华侨史》丛书中的《印尼华侨史》和《菲律宾华侨史》、陈碧笙主编的《南洋华侨史》等十余部华侨史专著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国际书展。温广益、蔡仁龙等4人合著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史》获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李学民、黄昆章合著的《印尼华侨史》获广东省优秀社会科

学研究成果三等奖和中南地区大学出版协会优秀教材奖；张泉林主编的《当代中国华侨教育》获全国首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黄滋生、何思兵合著的《菲律宾华侨史》、杨国标等三人合著的《美国华侨史》和张兴汉等主编的《华侨华人大观》获中南地区大学出版社协会优秀教材奖；曾瑞炎的《华侨与抗日战争》获1989年四川省优秀图书奖，李春辉、杨生茂主编的《美洲华侨华人史》获1991年第五届中国图书奖二等奖。

辞书、华侨志的编写以及译著和普及读物的出版，使华侨、华人史研究呈多样性。由周南京、梁英明、巫乐华等主编的《世界华侨华人大辞典》、陈乔之主编的《华侨华人大词典》这两部大型工具书已经定稿。综合性大型辞书的编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侨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广东、福建等省编写的华侨志已陆续完成出版，为侨史研究收集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在翻译工作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近年来出版了十余部译著，把一些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的华人学者的著述介绍到国内，促进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此外，还有一些华侨华人的普及读物出版，它们对帮助世人了解华侨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们高兴地看到，侨史研究的领域正在逐步拓宽。1982年至1985年间，国内各种刊物发表的侨史文章约400余篇，其内容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侨情的大约只占3%。1986年之后，研究的领域就逐步拓宽了。许多专家、学者重视对当代华侨、华人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社团、认同等问题的研究，研究趋于不断深化。

（三）国内外学术交流在不断发展。

10年来，国内外的学术交流活动有了可喜的进步。1985年12月，中山大学在广州召开了有10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参加的“华侨华人历史研讨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在中国大陆举办的以华侨华人历史为中心议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1989年4

月，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与新加坡南洋学会、福建华侨历史学会以及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在厦门联合召开了“战后海外华人变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参加这次会议的150余名专家学者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联邦德国、香港以及中国等13个国家和地区，提交论文74篇，就战后华侨华人的经济结构、华文报刊、华文教育、华文文学、华人社团，以及参政和认同诸多问题，进行了切磋。这两次在中国大陆召开的较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都已出版了论文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海内外的研究水平。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学者出访的机会渐渐增多。10年来，有20余名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的会员应邀到海外10余个国家和地区进修、考察或参加有关的学术交流活动。海外学者到中国大陆访问、讲学的就更多了，仅广东华侨历史学会就先后接待了40余批共120余人次。此外，中外侨史学会以及上海、广东的华侨历史学会，曾与美国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合作，先后在上海、北京、广州、中山、台山、开平等地举办《美国华人历史图片展览》，观众达30余万人次。1986年底，新加坡南洋学会的学者会同云南、北京的侨史学者，在云南境内原滇缅公路沿线对抗战期间回国服务的3000余名南洋华侨机工的战斗史迹进行考察。双方合作编写出版了《南侨机工回国抗日史》一书。

中外学术交流，扩大了我国侨史工作者的视野，密切了与国外学术机构的联系，有助于我国侨史研究水平的提高。

综上所述，中国华侨历史学会成立以来的10年间所取得的成果，是过去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的。毫无疑问，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说，华侨、华人史这一学科已经逐渐为社会所承认，在史学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在党和国家正确的路线方针指引下取得的。如果不经拨乱反正，没有国家的稳定，没有改革开放的大气候，没有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就不会有今天侨史研究的新局面。还必须指出，侨史研究事业能有今天，也是与老一辈侨务

工作者和学者的支持以及大家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的名誉会长廖承志、庄希泉，会长洪丝丝，副会长司徒慧敏、孙孺以及顾问朱杰勤等同志，相继逝世。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大家对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感受尤深，同时也深切怀念为学会作出很大贡献的老前辈。

三、关于今后工作的几点设想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探讨今后学会的工作问题之前，首先我想对海外的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作一个简要的叙述。

美国华侨华人中的有识之士，早在60年代初就开始认识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成立了美国华人历史学会、夏威夷华人历史研究中心、南加州华人历史学会、纽约华埠历史研究社、美国西北华人历史学会、旧金山中华文化中心等学术团体，吸收了2000多名会员，多学科地开展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新加坡的学者对华族历史的研究具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他们在南洋大学开设“东南亚华人史”课程，培养年轻的研究队伍，并有计划地开展“华族村史调查”，建立档案与口述历史馆。从1984年到1990年，新加坡南洋学会先后在新加坡、台北、香港、厦门等地单独或联合召开了5次大型的国际华人历史研讨会，使新加坡的华族历史研究超越了本国的范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澳大利亚、菲律宾、日本等国家的华侨华人也成立了各种学术团体，从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法国等地的华侨、华人对博物馆和资料库的建设也非常重视，做了大量的工作，已初见成效。

从1980年以来，国际性的华侨华人历史学术交流活动日趋活跃。几乎每隔一、两年就召开一次相当规模的研讨会。由此可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日渐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新兴学科。

总之，近二、三十年来，海外华侨华人对他们自身历史的研究日益重视。这是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和群体，无论命运把他们抛向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他们都不会、也不能割断自己的历史。人们要面对今天、创造明天，首先就要回顾昨天。华侨华人重视对自身历史的研究是必然的。

中国是一个有11亿人口的大国，是国际大家庭的一员，同时也是海外华侨华人的母国，研究海外华侨华人的历史，探讨华侨华人社会的发展趋势，是责无旁贷的。十年来，我国的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在方法、选题、观点等方面都有了逐步的改观，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们的研究工作还跟不上形势发展的要求。对此，我们应当有时代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努力开创我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的新局面。

各位理事、各位代表，下面我想就今后学会的工作讲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进一步提高对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意义的认识。

今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北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部分专家、学者座谈时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社会科学队伍是一支重要的方面军。社会科学研究方向的正确与否、社会科学发发展状况如何，都会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江泽民同志的讲话，指明了我们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意义。

10年前，我们为侨史研究呐喊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是想从理论和历史上寻找根据，为那时的平反冤假错案和拨乱反正服务。今天，假如我们的认识只停留在这个水平上，那就不够了。

海外华侨华人及其在中国的亲属按一般估计约有6000万人，这大致与英国的人口相近。华侨华人史是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一脉相承的，它也是世界历史、特别是世界移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所说的，“我们的历史并不是祖先初到新加坡的时候才开始的，它早在5000年前中国文明创始时就

已经开始了。这段历史是我们的一部分，因为我们继承了这个系统与文化。”长期以来，华侨华人与世界各国人民甘苦与共，逐渐融合于当地主流社会，为那里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研究这部历史的形成、发展，不仅在学术上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对于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对于华侨华人的生存和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高兴地看到，海内外有识之士对此已逐渐取得共识。

（二）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重视华侨华人历史学科的理论建设。

社会科学只有沿着正确的道路才能健康发展，华侨华人历史的研究也是如此。我们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华侨、华人历史当作一个有规律的矛盾统一过程来研究，从中得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结论来。我们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方法，走与实践相结合、与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要继续贯彻“双百”方针，鼓励、引导不同的学术观点展开争论，以繁荣学术，把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近年来，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日趋繁荣，在社会科学领域取得了一席之地。不少有识之士已开始呼吁建立“华侨华人学”。在这种形势下，加强华侨华人历史学科的理论建设势在必行，我们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下，从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学、人口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边缘科学的最新成果中汲取营养，不断地摸索、探讨、归纳、总结，逐步建立起一套理论体系，使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当然，这方面的工作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需要作长期艰苦的努力。

（三）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加强对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发展的研究。

华侨华人历史是一个广阔的领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海外华侨华人在人口分布、国籍选择、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思想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们对这些变化了解还不够深刻。例如，尽管我们对华侨华人经济曾进行过一些探讨，但不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还很不够。对于目前海外近万个华侨华人社团的演度及其发展趋势，我们也只有零碎的认识，还没有进行比较完整、系统的研究。海外中华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道路、亚洲地区华侨华人的再移民以及参政、认同等诸多问题，都有待我们去作进一步的探讨。总之，随着国际社会的变化发展，涉及华侨华人历史的诸多新问题都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

（四）从我国各地实际出发，写出具有乡土色彩的地方侨史。

地方侨史是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具有自己的特点，是我们侨史研究的源泉。我们要立足国内、放眼海外，从各地实际出发，写好具有乡土气息的地方侨史。

我国的侨乡社会形成于19世纪，100多年来历尽沧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0余年间，侨乡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巨大的、深刻的，是以往任何时期都不能相比的。它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国界。我们要回答侨乡许多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就需要进一步拓宽领域，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30年代，陈达先生写过《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这本书不仅资料充实，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有所创新，至今仍是研究早期华侨社会的重要参考书。50年代末60年代初，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的史学工作者，曾对闽、粤、沪三省市的48个市县进行调查研究，积累100多万字有关华侨在国内投资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资料汇编和专著，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近年来，我国的侨史学者和侨务工作者对侨乡进行了广泛调查，编写了各地的侨务志，为侨乡研究积累了大批资料。我们希望侨史学者在此基础上把这项工作坚持下去，写出有关新侨乡的更多更好的专题调查报告和著作。

（五）利用多种渠道，积极开展海内外学术交流。

华侨华人历史是一门开放性很强的学科，它的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中外交往。海外的华侨华人和国内的归侨、侨眷，在血缘、地缘、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我们关起门来，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一部完整的华侨华人历史的。我们要与海外有关的专家学者、华侨华人团体、研究机构建立和保持经常性的资料交换联系并进行学术交流。我们还要逐步创造条件，努力争取派人到海外华侨华人聚居地进行实地考察和学术交流。我们与台湾侨史学者之间也要发展学术交流，经常切磋学术问题。我们希望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两岸的专家学者能够更密切地合作。

（六）注意培养新生力量，加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队伍的建设。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的深入和提高，都和研究队伍的建设分不开。目前，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的主力是有关高等院校、社会科学院的系、所或“中心”，但他们大多只是把华侨华人问题作为兼顾的研究对象。虽然80年代以来先后成立了几个专业的华侨华人问题的研究所，聚集了一批专业人员，但尚处于草创阶段，科研条件还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应该努力创造必要的条件，壮大这支专业队伍，充分发挥他们作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的主力军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充分发挥社会上热心侨史工作者的积极作用，使两方面的力量更好地配合与协作。

当前，华侨华人历史研究队伍普遍面临着结构断层问题，培养新生力量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应该把发现和培养青年研究者作为一项长期的、经常性工作来抓。这是我们的研究事业得以继承和发展的关键所在。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一批青年学人已崭露头角，有的已挑起了研究的重担。对此，我们应予以热情的支持和爱护。

（七）加强资料建设，争取建立全国性的华侨华人资料中

心。

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也不例外。目前，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还相当落后。研究人员难为无米之炊。因此，资料建设是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只能依托国内几所基础较好的大学和研究图书馆和资料室，加强资料信息和研究成果的横向交流。从长远着想，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华侨华人资料中心，并努力实现资料联网检索，更好地为研究人员提供服务。

（八）设立研究基金和出版基金。

目前，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工作还得不到有关部门应有的重视和必要的经费支持，因此，工作很难开展。我们热切地希望政府能给予扶持。我们还要积极筹集研究基金和出版基金，从物质上保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事业的发展。

（九）积极配合筹建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早在1956年，全国侨联第一届主席陈嘉庚先生就提议在北京建设一座国家级的华侨历史博物馆。现在，陈嘉庚先生的这一遗愿即将付诸实施。我们要积极配合博物馆的筹建工作。我们希望一座多功能的国家级华侨历史博物馆于“九五”期间在首都北京建成。

（十）努力办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提高刊物的编辑质量。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是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和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的机关刊物。它自创办以来，为侨史学界提供了一块发表成果、交流学术的园地，扩大了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在国内外的影响。其成绩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目前国内唯一的全国性的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的专门刊物，《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不论在编辑质量方面或学术水平方面，都还有待改进和提高。我们要总结经验，加强和改进编辑工作，以提高刊物的质量，更好地发挥它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中应有的学术导向作